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欧阳哲生  
编

# 蔡元培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欧阳哲生  
编

# 蔡元培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蔡元培卷/欧阳哲生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8877-5

I. ①中… II. ①欧…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蔡元培 (1868~1940)-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099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蔡元培卷

欧阳哲生 编

Cai Yuanpei Juan

---

|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 电 话  | 010-62511242 (总编室)                                                                                                               |      | 010-62511770 (质管部)  |  |
|      | 010-82501766 (邮购部)                                                                                                               |      | 010-62514148 (门市部)  |  |
|      |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      |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br><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 印 刷  |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      |                     |  |
| 规 格  | 160 mm×230 mm 16 开本                                                                                                              |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  |
| 印 张  | 41.25 插页 2                                                                                                                       |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 字 数  | 665 000                                                                                                                          | 定 价  | 89.00 元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要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奉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 导 言

蔡元培毕其一生献身于教育、科学事业。从1902年创建中国教育会，到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从1916年受命任北大校长，到192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这些新岗位上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新教育、新学术、新文化的领导人物和卓越代表。他可谓新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林语堂曾语重心长地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总是给人心悦诚服的。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老成人，大家觉得兴奋一点。何以这样？因为他是蔡先生。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青；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sup>①</sup>。这一评价可谓持平之论。蔡元培在创建新教育和开拓中国科学事业的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主张，表现了他对新文化的理想追求。蔡元培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在北大人心目中，是我们“永远的校长”。

蔡元培思想是中国新文化“古典时期”的一个范本。新文化在中国走过的历程不过一个世纪，但她的变化之大，变速之快，以致我们对蔡元培所领导的那场新文化运动若有一种“隔世”之感。蔡元培的新文化构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解构儒学意识形态，确立现代大学理念，融汇东西的文化观，以美育代宗教。这些思想带有浓厚的现代性和进步性色彩。这些思想的来源为其中西兼备的学问和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蔡元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包容性和中和性，正因为

---

<sup>①</sup> 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载《传记文学》，第10卷第2期，1967年2月。

如此，他的思想虽富有特性，但仍能与其他思想相对和谐共存，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文化应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 一、阅读史与活动史

思想家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读书，即来自书本知识，这自然与其读书经验相关；一是活动，即来自他的实践，这与其社会经验相关。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我们找不到闭门造车，躲进书斋成一统的思想家。

近代思想知识谱系构成的特点是中西结合。研究蔡元培的阅读史，我们可以获致这一认识。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诞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他自述早年的读书生活，五岁入私塾，初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接着读“四书”、“五经”。十三岁学做八股文，因先生指示他做文的依据是经书，所以他“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sup>①</sup>“从十七岁起，就自由的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sup>②</sup>十八岁至十九岁充任塾师，专讲国文。二十三岁，进京会试得中贡士。二十五岁，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七岁，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可以说到此，蔡元培过的完全是一个传统学人的读书生活，所走的路也不过是一个科举士子的成功之路。他开始接触西学或东学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这显然是受到当年中国战败的刺激，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有：《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阅后》（1897年7月7日）、《宋育仁〈采风记〉阅后》（1897年7月28日）、《森本丹芳〈大东合邦论〉阅后》（1898年9月8日）、《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读后》（1899年1月28日）等。他对东学、西学之兴趣由其所作《〈东西学书录〉叙》（1899年4月）一文可以窥见。1898年他与王式通等组成东文学社，开始学习日文。三十五岁任南洋公学特班教

<sup>①</sup> 参见《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84~8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sup>②</sup> 《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见《蔡元培全集》，第7卷，55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习，他自认，当时“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sup>①</sup>。以后又创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四十岁到北京任译学馆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赴德国留学，“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来比锡，进大学”<sup>②</sup>。关于四十岁以后的治学，蔡元培自我检讨道：

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这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sup>③</sup>

蔡元培的学习成长过程，以1895年为界段开，前期以应对科举，学习旧学（中学）为业；后期以学习新学、西学为主。其治学范围先为哲学、伦理学，后转向美学、民族学。他的著作有：《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石头记索隐》（1917年）等，编译的著作均出自德、日文，主要有：《哲学要领》（德国科培尔讲授，日本下田次郎笔述，1903年）、《妖怪学讲义总论》（日本井上圆了著，1906年）、《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1909年）、《哲学大纲》（据德国厉希脱尔著《哲学大纲》，参照泡尔生与冯德著《哲学入门》，1915年）、《简易哲学纲要》（德国文德尔班原著、日本宫本和吉编译，1924年）等，上述各种著作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显示了蔡元培与该馆的密切合作关系。

蔡元培并不是一个甘愿在书斋里度过一生的学者，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1898年秋，他愤激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离开京师，出走官场，回到家乡绍兴，担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从此他与旧的官僚体制切割，迈向探求新教育、新文化的人生之路。

①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05～506页。

② 同上，507页。

③ 《我的读书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31页。

在江浙进步士子中，蔡元培很快被推戴为领袖。1902年他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事务长。同年组织爱国学社，任学社总理。他自述：“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秘密赁屋，试造炸药”；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材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sup>①</sup>。1903年4月11日他在《苏报》刊载《释“仇满”》一文，文末宣示：“夫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而吾国之官行政界者，猥欲以螳螂当之，以招他日惨杀之祸，此固至可悯叹者也。而甲、乙两党又欲专其祸，以贻少数之满洲人，是岂非仇满之尤者乎？吾所谓仇满，固不在彼，而在此。”<sup>②</sup>显示了坚定的革命意志。1904年江浙革命党人聚集上海，成立光复会，他被推为会长。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任命为上海分会会长，再次确认其在江浙革命党人中的领导地位。蔡元培从此与革命党人共呼吸、同患难。

在革命党人成立同盟会的同时，清朝也宣布预备立宪，双方展开了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对决。在争取奔向日本、欧美留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国内各个新阶层方面，革命党人逐渐占住了上风。清朝因拖延宪政步伐，成立皇族内阁，而没有达到其整合中间力量和改良势力的目的，最后因集权于一身而陷入孤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闻讯后展开活动声援，并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成为民国新教育的设计师。在民国的重大政治关头，蔡元培都异乎寻常地发出了其对正义的呼喊。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蔡元培与吴稚晖等在沪创办《公论》，连续发表《敬告全国同胞》等七篇政论，揭穿袁世凯的阴谋。1919年5月2日他告知北大学生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激起学生的爱国激情。1932年12月，因不满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道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发表“关于民权保障”的演讲（1933年2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蔡元培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第二届名誉主席，他以“满江红”的词调，作《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

①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07页。

② 《释“仇满”》，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41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鼓励国人抵御日寇之决心。为追求国家进步、民族独立和社会正义，蔡元培确实表现了一个知识领袖的气节和献身精神。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周恩来曾送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以说是对蔡元培一生政治活动恰如其分的概括。

综览蔡元培的社会政治活动，他的活动人际圈：早期主要是在传统士人圈中活动；戊戌变法以后逐渐从维新走向革命，交友范围亦从维新人士扩展到革命党人，如张元济、吴稚晖、章太炎、孙中山、李石曾等；主持北大校务以后，北大师生簇拥在他的周围，他俨然成为北大派的中心人物；创设中研院以后，他的工作重心以中研院院务为主，是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 二、解构儒学意识形态

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这是摆在近代思想家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这一问题的拷问，有时对传统的依恋情感和冲破传统束缚的决裂要求这一矛盾常常伴随他们的一生，使他们的思想出现起伏不定的波状跃动。当他们有着强烈的创造欲求时，传统会像一张大网笼罩着他们；当现代性的流弊日渐暴露，他们又会想起传统人文资源可能的补救效应。传统若如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缠绕着他们。

蔡元培处理传统文化的基本做法是：一方面主张解构儒学意识形态，这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对儒家伦理加以改造，对其内含的合理价值加以利用，这与他个人对传统的深刻理解有关。

早在1912年中华民国初建，蔡元培走马上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为适应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即民主共和体制，他就力主对前清教育宗旨加以清理，他认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则

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sup>①</sup>这就将前清教育宗旨“忠君”、“尊孔”中所包含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内容作了坚决的否定，这对解构儒学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致命的一击。

蔡元培主张大学不应保留经科，中小学不必读经。“旧学自应保全。惟经科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也。”<sup>②</sup>他认为，从古至近，中国人有自弃一弊，“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sup>③</sup>。在他制定并颁布的《大学令》中，改八科为七科，废止经科，从而在学科设计上终止了经科。1915年蔡元培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上，发表题为“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的演讲，肯定废止经科是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之两大进步之一：“在我中华，孔子之道，虽大异于加特力教，而往昔科举之制，含有半宗教性质。废科学〔举〕而设学校，且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sup>④</sup>充分肯定教育摆脱宗教，废止经科是一大历史进步。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孔教，批判儒家伦理。蔡元培因身居校长地位，不便对此发表言论，但在林纾发文攻击北大新派教授“覆孔、孟，铲伦常”时，蔡元培回复《公言报》，对此作了有力回击，他以胡适、崔适、梁漱溟等北大教员的学术成果为例说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对《新青年》的反对孔教立场和对儒家伦理的态度作了界定：

今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

<sup>①</sup>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1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sup>②</sup> 《在北京任教育总长与记者谈话》，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159页。

<sup>③</sup>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264页。

<sup>④</sup> 《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405页。

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阅，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

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阅，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sup>①</sup>

为《新青年》反对孔教的言论作了辩护，这使北大校外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无所借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颁布的《大学院所发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指出：“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亟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sup>②</sup>“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不合，与蔡元培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不符，故坚决主张取缔。相形之下，国民党当局在30年代又重演祭孔的旧戏，对此，蔡元培发表了保留意见。“读经问题，是现在有些人主张：自小学起，凡学生都应在十三经中选出一部或一部以上作为读本的问题。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经书里面，有许多不合于现代事实的话，在古人们处他们的时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现代的儿童，就不相宜了。……所以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sup>③</sup>蔡元培与提倡读经者之间的立场明显有别。

① 《答林琴南的诘难》，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572～57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② 《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18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③ 《关于读经问题》，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6～57页。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曾经激励过历代士人修身自好、奋发图强，自然包含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此，蔡元培也有充分估价。他认为受儒家学说指导的中国古代教育至少有三大优点：“（1）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2）提倡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下，可以由个人自由钻研学问。（3）可以因材施教，教学不致因班级中有落后学生而受到影响。”<sup>①</sup> 他对传统的伦理教育和教学方法，对孔子的教学思想颇为欣赏，这在他编著的《中学生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等书中得以阐述。

蔡元培对儒家的中庸之道由衷地欣赏，视其为不同于西方思想的儒家精髓。蔡元培曾发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表达自己对三民主义的独特理解：“孙先生固然对于欧美的政治道理，研究得很博很深，然而他所以能想通的缘故，还是因为受了本国中和的民族性与中和的历史事实之大影响。”所谓“中和的意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就是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sup>②</sup>。试图在三民主义与儒家的中和性间做会通工作。在《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一文中，蔡元培继续发挥这一看法：“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为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这可用两种最权威的学说来证明他：一是民元十五年以前二千余年传统的儒家；一是近年所实行的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sup>③</sup> 儒家的中庸之道实构成蔡元培自由主义哲学的传统来源。

蔡元培晚年对孔子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有诸多肯定。他在《孔子之精神生活》一文中，称赞孔子在智的方面，“爱智”，“决非强不知为知”；在仁的方面，“求仁”，有“泛爱众，而亲仁”的博爱精神，有“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在勇的方面，“消极的以见义不为为无勇；积极的以童汪錡能执干戈卫社稷可无殇”。此外，“毫无宗教的迷信”，“利用美术的陶养”也是孔子精神生活值得称道的方面。他断言：“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

① 《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34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② 《三民主义的中和性》，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298～300页。

③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361～363页。